

袭常 ⑤ 新变

明清文化五百年

冯天瑜
著

錢穆與新變 明清文化五百年

錢穆與新變
明清文化五百年

冯天瑜

著

袭常⑤新变

明清文化五百年

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袭常与新变:明清文化五百年/冯天瑜著. —上海:
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8

ISBN 978-7-208-13874-2

I. ①袭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文化史-研究-中国-
明清时代 IV. ①K248.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35258 号

责任编辑 高笑红

封面设计 陈 酌

袭常与新变:明清文化五百年

冯天瑜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9.625 插页 5 字数 464,000

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3874-2/K·2520

定价 78.00 元

序 言

史者，非徒识废兴、观成败之往迹也，又将以明古今之变易、稽发展之程序。

——蒙文通：《中国史学史》

史学的功能，要者在展开历史发展过程，明其变易，方能识破兴废成败之底里。孟子曰：“观水有术，必观其澜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观史亦然，须从历史流程（尤其是转折处）着眼。讨论明清文化，需要将其置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波澜壮阔的进程中加以考究。

一

明清是秦汉以下帝制系列的末端，但这个末端并非细枝微节，而是相当庞大繁复的，与帝制雄阔的开端——秦汉遥相照应。

周秦之际发生了中国制度史上的一次大更革。秦代（前 221—前

206)是宗法封建分权的“周制”向宗法君主集权的“秦制”变异的节点,这种由“多”而“一”的转折,在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已然萌动,故王夫之《读通鉴论》称战国为“古今一大变革之会”。经由这种变革,至“秦王扫六合”,一统天下,方正式确立“郡县代封建”的君主集权政制,自此形成的定势,笼罩中国史程达两千年之久,人言:“历代皆行秦政制”,即此之谓也。然而,这精要的概括只讲出史迹之半,秦以下两千年并非单行“秦制”,或如某些昭示“仁政”的帝王及谋士宣称的纯以“周政”治天下,真实情形是:主法的“秦制”与儒家概括的“周制”互为表里、相与交织,帝王无一不左手持儒家经典、右手挥法家利剑,如汉宣帝所称:“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,奈何纯任德教,用周政乎!”(《汉书·元帝本纪》)。拙著《中国文化生成史》下册第九章详论于此,这里不再赘述。

明(1368—1644)清(1644—1911)是两千年宗法君主集权社会的晚期,周秦两制交集的制度一如秦汉以来之惯常,不过秦制尤其昭彰,其弊端被时之有识者批评,谋求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,清初顾炎武称自己所处时代“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”(《军制论》)。秦以下,有过汉晋更革、唐宋更革,但那都是在农耕文明—君主集权政治大格局内部的调整。中国历史上突破上述格局、以工业文明—民主政治为目标的大更革,在清末民初方得以展开,而明代及清代前中期恰值这一大转折的前夜,其国内表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文化出现,国际条件是西方近代文化初入中国。然“萌芽”幼弱、“启蒙”声希,明清文化主流延续着秦汉以降的常态,而扬弃性的文化变革在潜滋暗长,所谓“常”中寓“变”,“变”中有“常”,故明清文化宜以“袭常与新变”概括。

二

明清处于历史发展的特别节点，略言之——

第一，自秦汉以降，历经多个王朝兴替（不算地方割据政权，列入正史的朝代有：秦、西汉、东汉、魏、西晋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东魏、西魏、北周、北齐、隋、唐、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、北宋、南宋、西夏、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），而明清是与当下最为切近的两个王朝。此点似乎无须言说，却因其为研讨明清史不可轻忽的基点，故仍当阐明。

去古未远的明清可称之“近古”，其制度与文化，综汇前代，无论从积极意义还是从消极意义言之，都为近现代中国提供了最直接的遗产。这里且不议制度文化与形而上的观念文化，即从可触摸的形而下的器物文化论，唯明清保有较丰富的可供今人观摩的实存体。以建筑为例，中国历朝宫殿无算，但秦之咸阳宫、阿房宫，汉之长乐宫、未央宫，唐之太极宫、大明宫、兴庆宫，宋之艮岳，多毁于“改朝换代”的战火，消弭于历史尘埃，只可通过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、曹植《铜雀台赋》、杜牧《阿房宫赋》一类美文，遥想当年宫阙的壮丽，留下远望凭吊的惆怅。今人能实在见到的完整皇殿，只有明清紫禁城，那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的伟岸，彰显帝制的威严；那藏品之渊富，昭示中华声明文物的精深博大。先秦以下，京师、州县城垣更难以数计，当下仍然屹立的南京城、西安城、荆州城、平遥城等硕果仅存者，皆明清所建。战国以降，累代筑长城数万里，而完整保存至今的砖筑长墙只有明长城，吸引中外游客的渤海边山海关、金山长城、八达岭长城、慕田峪

长城、甘肃嘉峪关，在在如是。若以典籍为例，巨型类书《永乐大典》、最大辞书《康熙字典》、超级丛书《四库全书》无不集成于明清……

在一定意义上，经由“近古”明清，方能辨识“中古”汉唐、“上古”先秦；透过“近古”明清，方能了然近现代的由来有自。

第二，两朝五百余年是中国史上连续统一时间较长的阶段（只有两汉集合的四百余年统一时段略可与之比肩）。

明代从政制、军制、财制、文教制诸方面使掌控一统帝国的秦制得以强化，亦注意发挥周制的调适功能；清承明制，但张大了民族压迫要素（清前期尤甚），又较充分地融汇周制与秦制，集皇权制度之大成。明清的重要历史作用是，使秦汉以来一统国家的建构得以完备与强化，再无分权势力尾大不掉。如果说，汉代封国、郡县并列，唐代节度使掌握军政，导致藩镇割据，国家分裂不时发生（西汉吴楚七国之乱、西晋八王之乱，东晋后的五胡十六国、唐后的五代十国为剧演），而明清制度则杜绝分裂的可能，各种外力与内力皆不足以真正撼动统一大局。然而，明清使秦制极端化，专制罗网严密以至苛酷，障碍社会近代转型，束缚人的自由发展。明清制度的双重功能，为明清后时代提出维护“一统”与突破“专制”这颇相扞格的两大使命，容易顾此失彼，中国近代化进程因以崎岖错综。

第三，明朝是最后一个汉人王朝，清朝是继元朝后第二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大一统王朝。

传统中国有几个重大分野，为士众念念于兹，其中与“君子小人之辨”相提并论的便是“华夏夷狄之辨”。明清易代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，还有“华夷换位”含义在，这是非同小可的一大变故，黄宗羲称之“天崩地解”（《留别海昌同学序》），王夫之称作“地坼天乖”

(《五十自定稿·长相思》)、“天崩地裂”(《忆得·放杜少陵文文山作七歌》),不仅震撼中国,在朝鲜、日本等汉字文化圈诸国也引起强烈反响。因此,清末的社会变革,不仅要实现时代性递进(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,皇权专制向宪政民主转化),还要解决作为人口主体的汉族的民族性存续问题(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都曾以“反清复明”作号召,“排满”具有最广泛的民众动员作用)。更重要的是,时至清中叶以降,国人在抗御西力东侵之际达成中华民族共识,这是尤具深远意义的新的民族主义命题。古老的“华夷之辨”又迭加近代民族理念的形成,构造了近古数百年,尤其是晚清数十年朝野竞相求解的绝大题目,多少事变、多少人杰都围绕此题运转。这是明清史的复杂性超迈前朝的所在。

中国建立近代民族国家、形成文化认同,是在明清五百余年的错综进程中得以实现的。一个众族共生、多族互动的古老大国铸造近代民族国家共同体,较之单一民族国家(如日本、德意志)的近代立国远为困难。而明清两代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。值得详辨的是,清朝既有民族压迫深重的一面(以满人入主中原初期为甚,清末推出满洲亲贵主导的“皇族内阁”为其回光返照),又有满汉成功交融的一面(汉人士子在清朝发挥重要作用,康雍乾诸帝对汉文化的精深修养为其表征),还有实现诸民族亲和的一面(朝廷特设承德避暑山庄接待北方及西北诸族首领,展示了谋求民族团结的智慧),识者当全面观照,不可偏执一端。

第四,两朝皇权制度完备,汉、唐、宋抑制皇权的要素(如贵族权、相权等)被大为裁抑,明清攀援至君主集权制的顶峰。

明代削夺封建贵族权力(永乐以后诸封王“授土而不临民”,王侯未获诏旨不得进京、不得相互联络,禁止干预地方政务),废除秦汉以来沿袭千余载的丞相制度,皇帝直辖六部和行省三司,内阁成为皇帝

处理政务的秘书，还受司礼监制衡，又有厂卫严密监控，皇权几近极致。清承明制，明代中央集权体制基本照单全收，但保留满蒙贵族特权，又增设军机处，皇帝在几名近臣辅弼下独揽朝政。明清的皇权政治多有“不衷古制”的弊政（如明代频繁更迭以至杀戮首辅、廷杖处罚朝官，清代以文字狱恐吓士人，令其就范文化专制），其流弊之一是败坏官风、挫伤民气。现代哲人反思的“官腐民懦”“精神胜利”“看客心理”等“国民劣根性”，其近源正在明清专制政治对官民的精神戕害。

明清皇权专制达于极端，而声讨皇权专制的思潮也潜滋暗长，但皇权制度根深蒂固、皇权思想影响力劲拔，久久控扼朝野，即使清末革命洪涛掀翻帝制，而民主政治仍遭遇难产，这与明清皇权专制的强势遗传颇有干系。

第五，进入地主—自耕农经济成熟期，达到农业文明的最高水平。

明清的生产力规模，早期工业国尚不能望其项背。综合各种统计，18世纪前后的中国GDP约占全球二至三成（参见安格斯·麦迪森《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：公元960—2030年》等），其经济体量世界第一（但大而不强），并对早期工业国的产品有相当排拒力，而丝绸、瓷器、茶叶深受海外欢迎，因此外贸一直巨额出超。史载：18世纪中叶，中国每年出口欧洲的生丝约1万担，价值约140万两白银；英国人斯当东著《英使谒见乾隆纪实》记述：乾隆间，每年由外国商船运到欧洲的华茶约2000万磅，价值近400万两白银。当时正值西班牙等殖民主义国家在美洲墨西哥等地开采、冶炼白银，西方以之换取中国产品。从明万历开始，西班牙银元（时称“本洋”）流入中国，清中叶达到高峰，中国成为白银库存量最多的国度，德国人贡德·弗兰克著《白银资本》载：1545年到1800年，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6万吨。1/3到1/2的美

洲白银，最终输向中国，西方因以发生“银荒”。直至19世纪初中期，“世界工厂”英国的商品也难以打入“农业—手工业紧密结合”的中国市场，于是通过鸦片贸易使白银从中国大量外流，又令中国人体质精神双双孱弱，成“东亚病夫”，以便驱使。此祸延绵百年。

明代中后期，既有资本（白银），又有国际市场，长江三角洲、晋东南等地商品经济繁荣，“机户出资，机工出力”的工场手工业发展，区域商品市场形成，晋商、徽商、浙商名满天下，在经济、文化、社会诸领域颇有建树。然而，“农业—手工业紧密结合”的生产方式对商品经济的抑限，专制皇权（通过皇庄、皇店，矿监、税使）对民间工商业的超经济剥夺，使资本主义萌芽如大石镇压下的植物，难以健康发展，一度享誉天下的工商品牌大多成“断尾蜻蜓”（晋商、徽商乃至广东十三行中的著名的商号皆未延传下来），绝少如日本的住友（1590年开端）、三井（1673年开端）、三菱（1870年开端）、安田（1863年开端）那样持续发展数百年的工商企业。此种情形延至当代，调查显示，今之日本有150年以上历史的企业高达21666家，而中国仅有“六必居”、“张小泉”剪刀、“陈李济”、“同仁堂”药业等为数极少的“百年老字号”（多为餐饮业、中药店及小手工业）。

明清鼎革之际大规模战乱的摧折，使商品经济遭受重挫（“嘉定三屠”、“扬州十日”正发生在工商业经济、市民文化最发达地区）。清初减免明代“三饷”、实行“摊丁入亩”，此皆善政，对复兴农业经济功不可没，“康雍乾盛世”由此奠定物质基石，然这类“轻徭薄赋”举措皆不逾古典范域，并无近代新机制可言，故清中“盛世”不过是旧道踱步。明史专家李洵说，明清“只有资本主义萌芽时期，而没有资本主义确立时期”。诚哉斯言！

第六，国际环境异于往昔。

如果说汉、唐、宋面临经济落后、武功强劲的游牧民族来袭，“御胡”是基本的军事任务，明代依然如此（抵御北元和满洲），然晚期又有携西方早期近代文明的传教士来访，在中国文化池塘吹起涟漪。这是继晋唐间南亚佛学入华之后，中国文化线与外来文化线的第二次交会。清中叶以降更有经济先进、船坚炮利的西洋殖民者入侵，国防重心从西北“塞防”转为东南“海防”，中国遭逢数千年未遇之强敌。晚清面临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，已无法沿固有轨迹运行，被动卷入世界近代化滚滚洪涛之中。

明初有郑和七下西洋（1405—1433）的空前绝世壮举（航海技术之高、船队规模之大，均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西方诸次远航之上），展示了高级农耕文明和一统帝国的富强和对外展拓能力。然而，此一远航虽推进了商贸发展，然主旨并不在此，昭显帝威才是宏愿所在。乏于经济收益及社会动力的政治性远航被时人视为劳民伤财、无益有害的弊政，在发动者永乐帝、实行者三宝太监相继辞世后，必然人亡政息，难以为继，不仅自弃巨舰，连远航档案都加以销毁。诚如梁任公《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》所谓：哥伦布、达·迦马后有无量数哥伦布、达·迦马，“而我则郑和以后，竟无第二之郑和”。加之明清两朝相继厉禁民间海洋航运，中国自行退出15世纪末开端、一发不可收的世界大航海潮流（也就止步于近代工商业文明的门槛之外），中国在中世纪的“先进”地位就此打上句号，等待着四百年后西洋人以枪炮和工业品击破闭锁的国门。

自己终止“走出去”，必然被外人“打进来”，这是明清史昭示的教训，也是从分散趋向整体的近代世界史作出的结论。

三

文化的某些成分（如风俗习惯、行为方式、艺术形式的若干断面），不一定有先进落后之别，如中医与西医、筷子与刀叉、京剧与歌剧、水墨画与油画，各具特色、各有优长，不必作线性比较；而物质文化（以生产力水平为主要标志），还有制度文化及观念文化的某些部分，在历史行程中后浪逐前浪，存在先进落后的线性序列。以后一侧面而论，明清五百年，是中国在世界文化总进程中从先进跌入后进的历史转折阶段。

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”（陈寅恪语），宋代生产力及科技、文化水平领先世界，明至清初大体与欧西持平，清中叶以降则落入“后进”行列。这并非是清代在衰退，而是因为自恋于“天朝上国”，固步徘徊，被国人十分陌生的工业化西洋及后起的东洋日本弯道超越（鸦片战争中国败局已定之际，道光皇帝还不知对手英吉利是何方神圣，是否与大清接壤；中日甲午战争时，清方朝野对新兴的日本茫然无知），陷入落后挨打困境。

近代以前，国人以“文明物之邦”傲视群伦，很少作文明水平的国际比较，我们只得从外国人的评华言论中略见大貌：元初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对大都、杭州充满景仰，对“契丹”（实为中国）文明的先进性多有佳评；明末清初来华西人利玛窦、艾儒略、汤若望、白晋、张诚等留下多种对中国的观察记录，褒贬杂陈，却未见从总体上指中国“落后”的言论。

18 世纪的西欧，推崇中国文明（伏尔泰、魁奈等）、贬抑中国文明

(亚当·斯密、孟德斯鸠等)并存,然推崇占主导。18世纪末叶以降,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效以加速度显现,中西文明水平差距急剧拉大,发现中国落后的西人,由凤毛麟角变得如过江之鲫。乾隆五十八年八月(1793年9月)为乾隆帝祝寿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,窥破貌似强大的“中华帝国”的虚弱本质,将清朝称之为“泥足巨人”(《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》)。这是外人关于中国已入颓势的较早评述。

19世纪入华西洋传教士、商人、军人、外交官、学者的中国见闻录,更充满中国“落后”的记录(见林乐知、李提摩太、戈登、赫德等人的评华言论)。同为后进国的日本于江户幕府末期,在锁国两百年后,首次派官船“千岁丸”造访中国上海,随船日本武士原先多对文化母邦中国怀有敬畏,但他们目睹的清朝,一片破落景象,官腐民弱,日本武士的中国观遂由崇仰转为鄙夷,甚至萌生“率一万骑,扫平中国”的狂念。须知,那时的日本尚处半殖民地弱势状态。(见笔者著《“千岁丸”上海行——1862年日本人的中国观察》,商务印书馆2001年)

至于中国人,在门户开放后也开始注意中外比较,发现自身的落后,如冯桂芬《校邠庐抗议》有六“不如夷”之论(“人无弃材不如夷,地无遗利不如夷,君民不隔不如夷,名实必符不如夷”,“船坚炮利不如夷,有进无退不如夷”)。而承认落后,正是奋起直追的开端,“始则师而法之,继则比而齐之,终则驾而上之。自强之道,实在乎是”。王韬更一反仅仅把西力东渐视作灾祸的观点,认为这同时也是中国进步的契机,他在1864年所撰《代上苏抚李宫保书》中指出:“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,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,此古今之创事,天地之变局,所谓不世出之机也。”(见王韬:《弢园尺牍》卷七)

自孙中山以来,觉醒、有担当的中国人高唤“振兴中华”,便是要

抓住这“不世出之机”，从近二百年颓势中超拔出来，追向世界文明的先进行列。

四

以上概述明清所处的历史方位，由此派生的明清文化因以呈现“集古”——“萌新”的双重属性。

其一，明清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总汇期。

典籍整理、文化集成工作自明而清，以空前浩大的规模展开，类书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辞书《康熙字典》，丛书《四库全书》均为中国乃至世界相关典籍之最。

订正、考释古典的考据学始于明中叶（杨慎等为代表），清中叶更为学术主流，代表学者有以惠栋为首的“吴派”（沈彤、江声、余萧客、江藩、王鸣盛等）；以戴震为首的“皖派”（段玉裁、程瑶田、金榜、孔广森和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等）；阮元代表的“扬州学派”（任大椿、焦循、汪中等）。乾嘉考据学对古代典籍作系统整理、对传统文化作全面总结，使得数千年来各个学科、各个领域的专门之学得到发掘、彰显和条理化。其研究对象重在古籍、古史、古器物，治学态度如“老吏断狱”，“实事求是”、“无征不信”，其理性态度、实证方法，与近代科学并无二致，对中国乃至日本的近现代学术影响深巨。

明清集传统科学技艺之大成，药物学巨著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，农学总成且汲纳西学的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，手工业技艺百科全书宋应星的《天工开物》，地学杰构徐宏祖的《徐霞客游记》，造园绝世经典计成的《园冶》，沿袭两百余年的雷氏建筑术（仅国家图书馆就珍藏“样

式雷”两万多张建筑图样)等等,均达到前工业时代的最高科技水平,即使今日观之,也颇有发明、发现方面的启示。

其二,程朱理学主导精神世界,继之心学崛起,又复归于程朱,构成明清形上学的圆圈,晚清新学勃兴方突破此一圆圈。

自晋唐以降,佛教与道教在信仰世界的影响力愈益增强,儒学退守,至宋明,儒者在消化吸收佛道思辨成就的基础上,展开类似晚周孟子“辟杨墨”的“辟佛老”努力,一种思辨化的、以伦理为核心的新儒学——理学在宋代兴起,提供克服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的精神武器。中经元代,至明清,朝廷推尊理学,将二程朱熹论证的“纲常”“天理”规定为伦理、政治指针,《四书》朱注成了科举考试范本。富含理性和民本精神的儒学,因为官方片面伸张、强力推行而趋于僵化,衍为一种御用的“制度化儒学”,礼教渐趋严密地桎梏公私精神生活,与亚里士多德学说在欧洲中世纪教条化的情形颇相类似。而明中叶崛起的阳明心学,强调个体心性修为,倡导“致良知”“知行合一”,有思想解放心蕴在。由阳明学衍生的泰州学派反映市民阶层突破礼教樊笼的诉求。

与心学在明末走向空疏相抗衡,眼光投向社会实际的经世实学也有发展(自明末至清末多种“经世文编”的修纂显示此学的昌盛),架设通向近代新学的桥梁。

极端的专制皇权激发明清之际“非君论”涌动,在市民文化及党社文化中产生出继承并超越先秦“民贵君轻”说的“新民本主义”,不仅谴责个别暴君、昏君,其批判锋芒普遍地指向“今之君”,即秦汉以降皇权专制制度下的全体帝王(黄宗羲《明夷待访录》、唐甄《潜书》为代表作)。笔者与谢贵安合著《解构“专制”——明末清初“新民本”思想研究》有详论,此不赘。明清之际,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、唐

甄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潮别开生面，但在皇权高压下，此种思潮只能暗流潜行（“待访录”“潜书”两书名传神地表达了此种窘态），且在清中叶沉寂百余年，嘉道间的龚自珍、魏源重振其说，成为近代民主思想的前导。而近代新学萌动之际，颇多对“晚明遗献”的借助，这正是一种“以复古求解放”的历史辩证法之显例。

其三，伴随城市经济发展，市民文学蓬勃兴起。

俗谓：中古至近古文学主潮经历了“唐诗—宋词—元曲—明清小说”几阶段。小说确乎是近古最具特色的文学样式。明清小说从“魏晋志怪志人—唐代传奇—宋元话本”一路走来，渐成洋洋大观。传奇、话本都是短篇，明清短篇精进不已（明末“三言二拍”，清代《聊斋志异》皆短篇集合），更涌现长篇巨制，讲史小说《三国演义》，英雄小说《水浒传》，神魔小说《西游记》，世情小说《金瓶梅》、《红楼梦》成为古典文学新的楷范。

明清出现将小说、戏曲提升到与诗文并列地位的议论，甚至认为其教化功能可与经书相比配。明人李贽称《水浒传》和《西厢记》“皆古今至文”（《焚书》卷三《童心说》），公安三袁服膺其说；清人金圣叹称：“天下之文章，无有出《水浒》右者；天下之格物君子，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。”（《水浒传序三》）明清小说在思想及手法上一创全新格局的是《红楼梦》。小说、戏曲繁荣，文学走出象牙塔，活跃于市井勾栏，为雅士俗众共赏。加上童蒙读物流行，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，以明清为最。

其四，“西学东渐”、“东学西渐”双向互动。

明末清初，西欧耶稣会士东来，与徐光启、李之藻、王徵等中国士人协同译介西方文化成就（《几何原本》、《同文算指》、《坤輿万国全